



闕正宗

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

歷 史學博士，現任教於佛光大學佛教學系，曾於玄奘大學、法鼓佛教學院擔任兼任助理教授。研究專長於台灣佛教史、近代東亞佛教交涉史、佛教與民間宗教交涉，著有《台灣佛教一百年》、《重讀台灣佛教——戰後台灣佛教（正、續篇）》、《台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》、《台灣佛教史論》、《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》、《台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——「皇國佛教」的歷史進程》等專書，以及相關佛教論文集數十篇。

抗戰勝利後青年星雲佛教改革的萌芽（一九四五～一九四八）

一、前言

一九四九年春，星雲大師來台，輾轉於各地，當時遠在東台灣的宜蘭雷音寺，雖然早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成立「週六念佛會」，但是，乏人領導，前來弘法的緇素總是來去。雷音寺渴求常住弘法僧眾不可得，最終於一九五三年春後，寺方護法李決和與林松年二人到中佛會求助，獲青年星雲的首肯。

青年星雲從一九五三常駐宜蘭雷音寺，至一九六二年南下高雄開創壽山寺，以整整十年的時間，奠定了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藍圖。然而，青年星雲佛教改革的思想萌芽甚早，非自來台而始。

本文以抗戰勝利初期，青年星雲一篇罕為人知的文章〈回憶比現實美麗——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〉，來探討其佛教改革思想。此文青年星雲以「星子」^①為筆名，談論抗戰勝利後京滬佛教的改革情況，而這也正是他日後改革佛教的萌生之濫觴。

註解：

①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（農曆元宵）承妙凡法師之邀上山賞牡丹，獲證實「星子」為青年時期星雲大師筆名之一。

二、佛學院教育的啟發

童年星雲因家貧而輟學，其求學歷程十分坎坷，出家後他表示：「經歷十年刻板的寺院生活，每天只有排班、禮拜、長跪、砍柴、挑水等。監學老師不准我們看報，不准我們用鋼筆寫字，不准看佛學以外的書籍；對於佛經、佛書又看不懂……直到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我進入棲霞律學院就讀，很幸運的，老師派我到圖書館，負責照顧圖書。」^②

靠著寺中所收藏師範學院圖書館的藏書，青年星雲閱讀不少書籍，「這時候我忽然感覺自己好像如夢初醒一般，發現人間還有這樣的寶藏。」^③並以「新佛教」的領袖太虛大師馬首是瞻，青年星雲「知道自己需要有新思惟、新觀念，要重新估定世間的價值」，「想到要生存，就必須適應這個新時代。」^④雖然不知道什麼是「新佛教」，但是他認為「這個時代需要改革、需要創新，佛教不能像過去只是契理，重要的是契機。」^⑤

註解：

- ②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4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二〇一二年，頁406。
- ③ 同註②，頁406。
- ④ 同註②，頁406。
- ⑤ 同註②，頁407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一九四六年冬天，青年星雲離開焦山回到祖庭白塔山大覺寺，^⑥從他進入焦山佛學院曾任一年半的「菜頭」看來，^⑦青年星雲約在一九四五年春後入學焦山佛學院。無論如何，新時代的來臨，所謂「時代考驗青年，青年創造時代」，是最好的註腳。佛教在鉅變時代的適應，以及叢林學院的興革，已然形成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觀的一部分。眼見僧侶的素質低落、佛教的衰微，青年星雲說：

在雍正廢除官牒及考試制度以還，宗風丕變，亂收徒，亂傳戒，流品斯雜，知識水準愈趨愈下，遂使佛教制度，從斯一蹶不振。究其病根，泰半是佛教徒無遠大眼光，僅知在消極的一方參禪念佛，獨善其身，演教談經，死守窠臼，而在積極的一方，灌輸知識，團結群力，則懵然不知。故結果淪為晚近腐惡消沉遭人藐視之現象，寧不痛心！^⑧

註解：

- ^⑥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1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二〇一二年，頁56。
^⑦ 同註^⑥，頁179。
^⑧ 今覺：〈為僧伽問政而不干治進一解〉，《覺群周報》第一卷第十期，一九四六年九月，頁二。

青年星雲慨嘆民初僧侶素質：「佛教到今天，所以這麼不興，就是由於僧類的品類不齊，求戒和得到戒牒太容易了……」^⑨民國佛刊反映了此一事實：「嗟嗟熟知龍象潛蹤，英哲罕見，出家者多，向道者少，口談者遍，實行者寡，或以登戒品，三年未修，乍入叢林，一經不識。似此不啻俗眼，有類啞羊。」^⑩因此，青年星雲南下創建壽山寺乃至成就佛光山，都是從僧教育開始，這絕對不是巧合，而是他深知佛教教育對佛教改革發展的重要意義。

三、抗戰勝利後佛教辦的各種教育

(一) 佛教辦各種中小學

抗戰勝利後，江蘇及京滬一帶的佛教情況，青年星雲觀察到：「住持老和尚忙辦佛教學院，青年僧們忙著讀書，當法師的忙教書忙出版佛教雜誌，鄉村小廟裡的僧徒忙著增

註解：

- ⑨ 星雲大師：《無聲息的歌唱·戒牒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二〇一〇年，頁125。
⑩ 〈昭覺寺設立學校〉，《佛學旬刊》第二十七期，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，頁169。

產，居士們熱心地忙著為佛教護法奔跑，新來皈依佛教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。」^⑪
不知道當時全中國大陸佛教是否都是如此，但至少京滬一帶作為日本占領的中心，勝利後佛教似乎漸有起色，就雜誌的創辦來說，青年星雲就曾經主持《怒濤》月刊，來台後還曾編輯過《人生》。

眾所周知，太虛大師隨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，組織「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」，同時預定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召開包括台灣在內的全國佛教代表大會，但大會未成，太虛大師已於同年三月圓寂。而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秋，佛教界隨著戰後復員，努力於各種佛教改革事業，如當時在京滬一帶的社會教育情況是：

民國三十四年秋到三十七年的秋天，這僅僅四年的時間，江蘇和京滬的佛教徒不知做了多少可歌可頌的事業……虛大師在重慶本來創辦一所大雄中學，這時候也由重慶遷到臥佛寺開學了。……此外，棲霞山志開和尚辦了宗仰中學，只收男生，董事長是于右任先生，董事有孫立人將軍等，湯禮志先生當校長，陣容非常

註解：

⑪ 星子：〈回憶比現實美麗——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〉，《覺生》第七、八期合刊，一九五一年一月，頁二。

雄壯。雨花台普德寺的覺民和尚辦有普德中學，教員有北京大學畢業的聖緣法師，國立安徽大學畢業的治愚法師，清華大學文學系畢業的爾明法師。和尚辦中學，和尚當教員，這真是僧徒一時高尚的風氣。三岔河雲寺辦有資生農業學校，優曇和尚任董事長。國立音樂院旁邊的金陵寺正籌辦著金陵中學。上海有興慈中學，是興慈老法師創辦的，裡面特別設一教室教導出家學僧的佛學，出家學僧除繳膳費外不要學費……

除了忙辦中學外，一般僧徒創辦小學的也真如雨後春筍。單是江蘇一省就辦了二十餘所小學：鎮江有超岸寺小學，鶴林寺小學，福善堂小學，焦山定慧寺單獨辦了三所義務小學，宜興大覺寺辦有白塔小學，溧陽縣佛教會辦有下橋小學，上海縣有南翔小學，東台有泰山小學，泰州有淨因小學，東石羊小學，南京法雲寺辦有三百多名的孤兒院，大雄中學有附屬小學，淮安辦了三所佛教小學，這都是勝利後才創辦的。^⑫

註解：

⑫ 星子：〈回憶比現實美麗——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〉，《覺生》第七、八期合刊，一九五一年一月。

抗戰勝利後除了僧教育外，佛教界創辦中小學亦不少，清末民初深受「廟產興學」打擊的影響，似乎在戰後開花結果。如上述的宜興白塔小學，星雲大師就曾任校長，那是他離開焦山佛學院之後的事，星雲大師回憶道：

離開焦山之後，在一九四七年底，我回到白塔山祖庭大覺寺一段時間。那一年我二十一歲，年紀輕輕就獲得擔任小學校長的機會，因為這是政府任命的職務，我也極願意承擔，感到為公家服務是自己的榮幸。這個時候的我也懂得如何讀書了，於是就在祖庭一面精進自修，一面就做起校長來，實在很感謝宜興教育局任志盤局長給我這個機會。^⑬

青年星雲在抗戰勝利後，觀察到佛教創辦一般中小學如雨後春筍，時間正好是在他離開南京前往鎮江焦山佛學院，最後於一九四七年底主持宜興白塔小學之間。

註解：

⑬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 2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二〇一一年，頁153。

(二) 僧教育的進展

抗戰勝利後，佛教界除創辦中小學教育外，僧教育亦是大有進展，青年星雲看到的情況是：

上海有靜安寺佛學院，天竺寺有佛學研究所，玉佛寺有上海佛學院，法藏寺有法藏佛學院，圓瑛法師辦有圓明講堂，在南京有棲霞山寺的律學院，毘廬寺有毘廬佛學院，古林寺有古林佛學院，普德寺有普德佛學院，金陵寺有金陵佛學院，龍潭寶華山有學戒堂，鎮江還有竹林寺的竹林佛學院，常州有天寧寺佛學院，無錫開元寺有漢藏佛學院，蘇州靈巖山有研究院，泰州光孝寺佛學院，北山寺有北山佛學院；尼眾界在上海有上海尼眾佛學院，江陰有江陰尼眾佛學院，泰州有準提庵波闍尼眾佛學院，這些都是有名有實的佛學院，決不是只有招牌而無內容。^⑭

清末民初深受「廟產興學」打擊的影響，佛教在世俗教育與僧教育上，似乎在戰後開花結果。抗戰勝利後，青年星雲往來於南京、鎮江、上海、宜興等地，一方面移動觀察，

註解：

⑭ 《甲子慶：星雲大師宜蘭弘法六〇周年》，台北：福報文化，二〇一四年，頁37。

一方面從佛刊了解到佛教界辦學的熱潮，這都成為他來台後建設人間佛教教育的藍圖。

從一九一二至一九五〇年，全中國大陸佛學院所培養畢業的學僧大約七千五百名左右，還不到僧侶總數的百分之二，¹⁵幾乎是萬中取一之選。然而，民國以降，佛教辦學失敗的多，成功的少，據諦聞法師的觀察：

民國以來的僧教育辦的無慮數十處。結果却都曇花一現，旋起旋滅的居多，察其癥結之所在，一因經濟的不充足，想辦而不能辦，勉強停辦的也有。一因學院多半附設在叢林內，往往學僧與常住職事，意見衝突，不得已而停辦的也有。一因學風不良，學僧時常鬧事，提不起辦學的精神，處處令人痛心，氣憤而停辦的也有，因此國內的僧教育就這樣的衰微下來了。¹⁶

從失敗中吸取教訓，青年星雲曾參學於棲霞律學院、鎮江焦山佛學院、寶華山學戒

註解：

¹⁵ 美·霍姆斯·維慈 (Holmes Welch)，王雷泉等譯：《中國佛教的復興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，頁96。

¹⁶ 諦聞：〈閩院學潮後之感想〉，《諦聞影塵集》，寧波，一九三七年，頁29。

堂、常州天寧寺禪堂等，深知完整的佛學教育對於佛門人才培育的重要性。抗戰勝利後，青年星雲觀察到京滬一帶的佛教逐漸復甦，他表示：

勝利後的江蘇和京滬的佛教，適從自利的佛教走上人利的佛教，從保守的佛教已經走上進取的佛教，從一盤散沙的佛教走上精誠團結的佛教，從山林的佛教走上社會的佛教，從經懺的佛教走上進入工廠的佛教，從黑暗和衰敗的佛教步上光明和興盛的佛教。^⑰

來台後，青年星雲為了興辦佛教教育，以培養佛教人才，達到教化社會、弘法濟世的目的，立下辦學宗旨：「為造就佛教專門人才，以從事佛教教育、文化、慈善等事業，住持佛教，宣揚佛法，達到人心之淨化，社會之安和樂利。」^⑱這和他早年就讀於多所佛學院的經驗，及觀察到抗戰勝利後佛教僧教育的改革有關。

註解：

- ⑰ 星子：〈回憶比現實美麗——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〉，《覺生》第七、八期合刊，一九五一年一月，頁12。
- ⑱ 滿蓮：〈佛光山叢林學院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四期，二〇〇一年七月，頁12。

四、改革基地華藏寺

宜興大覺寺創辦白塔小學，但校長由公部門聘任，然白塔山「也是無隔宿之糧的窮寺」，沒人要住，志開上人於是收留外寺來僧滿成法師為徒，前來擔任當家。白塔山米糧不夠吃，青年星雲從小學上完課「下課回來不得中飯吃，也不能喊人弄飯，因為我既不是當家，也不是住持」，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。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開始後，「白天學校有國民黨的軍隊進出，晚上又換成共產黨的游擊隊巡邏」，期間還遭共產黨逮捕，青年星雲又跑回南京討生活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棲霞山當知客，但因志開上人是住持，受其他幾位當家排擠，只好轉到南京華藏寺去。^⑲

欲將華藏寺作為改革基地的青年星雲，於一九四八年與弘度法師邀請當時在雙泉庵任教職的煮雲法師（一九一九—一九八六）同住，但因時局不靖，煮雲僅小住月餘即回雙泉庵。^⑳由於國共內戰起，青年星雲萌芽的佛教改革亦無機會落實，一九四九年春後隨軍來

註解：

⑲ 星雲大師：《百年佛緣2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二〇一一年，頁153-157。

⑳ 煮雲老和尚文教基金會，《煮雲和尚紀念專輯·煮雲法師年表》，高雄：鳳山佛教蓮社，一九八九年，頁10。

台，輾轉各地，最終落腳於宜蘭。

五、結語

一九五一年中佛會遷台後，以公函附錄的方式反應了一九四九年中國佛教之情形，文中指出，大叢林之廣大寺產「僅個人受用」或「非法行為者，亦不在少數」；傳承制度「良莠不齊」，「寺廟有宗派之名，無系統之實」；佛教教育因「私心之表現」而曇花一現；傳戒授徒「末流所趨，則以經懺為職業，化緣為資源，不復知佛法為何事」；教會組織「仰地方機關之鼻息」甚至會費亦無法收齊，故「雖有教會而無成就」。²¹

抗戰勝利至一九四八年間，青年星雲往來各地，除南京棲霞山，鎮江焦山佛學院、寶華山學戒堂、常州天寧寺禪堂等，並大量閱讀佛教期刊，萌發了他佛教的改革思想，從〈回憶比現實美麗——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〉一文，得知青年星雲對於京滬一帶佛教辦學知之甚詳，同時也啟發了他來台後辦學的理念。

註解：

²¹ 〈大陸淪陷前佛教之概況〉，《人生》第三卷第五期，一九五一年六月，頁12。